

无锡轻工业学院

0248165

王充

江南大学图书馆



11326789

上海人民出版社

王 充

嘉定县望新公社理论组 《王充》组编写
复旦大学中文系 1972 年级

江南大学图书馆



91473456

上海人民出版社

0512090

0512090

王 充

嘉定县望新公社理论组
复旦大学中文系1972年级“王充”组编写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 字数 133,000

1976年10月第1版 1976年10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1171·209 定价: 0.51元

目 录

一 生平和时代	1
(一)坎坷和战斗的一生	1
(二)风云变幻的斗争时代	8
1. 西汉末年的农民革命和所谓的“光武中兴”、 “明章之治”	9
2. 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深入	14
(1) 西汉前期的“尊法反儒”和东汉前期的“尊儒反法”	14
(2) 白虎观会议	20
(三)《论衡》的诞生	28
1. 《论衡》产生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	30
2. 《论衡》的思想渊源	36
3. 《论衡》的思想特色	42
二 反儒尊法的斗争	48
(一)伐孔刺孟	48
(二)对于儒书的批判	60

(三)对于儒生的批判·····	71
(四)对于儒家复古主义的批判·····	80
(五)沿着法家路线前进·····	90
 三 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	105
(一)唯物主义的自然观·····	106
1. “夫天者,体也,与地同”	
——否定“天者,百神之大君也”的唯心主义	
神学天道观·····	107
2. “天地合气,物偶自生”	
——驳斥“天地故生万物”的神学目的论·····	114
3. “天不与人通”	
——批判“天人感应”说·····	125
(二)战斗的无神论·····	138
1. “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	
——驳“有鬼论”·····	140
2. “死者生之效,生者死之验”	
——批神仙思想·····	149
3. 祸福吉凶“在人不在鬼”	
——反对其他各种迷信风习·····	156
(三)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166
1. “圣人不能神而先知”	
——戳穿孔丘“先知”的画皮·····	167

2. “知物由学, 学之乃知”	
——批判“生而知之”的先验论·····	172
3. “事有证验, 以效实然”	
——反对“空言虚语”的唯心主义真理观·····	182
四 尊法反儒的文艺观·····	189
(一)反对“虚妄之文”, 主张“文以称实”·····	192
(二)反对“造生空文”, 主张“文为世用”·····	202
(三)反对“褒古毁今”, 主张“造作新文”·····	211
(四)反对“雕文饰辞”, 主张“文实副称”·····	223
五 结语·····	240

一 生平和时代

(一) 坎坷和战斗的一生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人。生于东汉光武建武三年（公元二七年），死年大约在和帝永元九年（公元九七年），活了七十多岁。关于他的生平和事迹，除了《后汉书·王充传》以及《论衡·自纪篇》略有记载之外，留传下来的材料很少。但根据这仅有的材料和他的战斗业绩，我们已经可以知道，他的一生，是坎坷和战斗的一生。

王充生活的时代，是豪族地主专政的时代。不但广大劳动人民被压在最底层，即使中小地主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也感到没有出路。王充就因为他是所谓“细族孤门”，家世并不那么显耀，所以遭到达官显贵们的嘲笑和排斥，说他“宗祖无淑懿之基，文墨无篇籍之遗，虽著鸿丽之论，无所禀阶，终不为高。”^①那就是说，王充没有显贵的门第，没有家学的渊源，纵然写出了长

^① 《论衡·自纪篇》。以下未注明出处的，均引自此篇。（本书《论衡》引文均据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 9 月版《论衡》，以下只注篇名。）

篇巨著，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那么，王充的家庭出身究竟怎样呢？他在《自纪篇》中说：他的祖先本是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人，后来因为“从军有功，封会稽阳亭”，是一个小侯爵^①。因此，王充的祖先曾经一度挤进封建贵族的最低层，这是他家最为显达的时候。然而，“一岁仓卒国绝，因家焉。以农桑为业。”就是说，受封不过一年，就垮了下来，回不了魏郡元城，只好在会稽住下来，“以农桑为业”。这是他家的第一次败落。后来又由于“世祖勇任气”，和地方上的豪强势力搞不好关系，“会世扰乱，恐为怨仇所擒”，所以祖父王汎便带着家小，挑着铺盖卷，仓皇出走，来到会稽钱塘县，“以贾贩为事”。这大概是王莽前不久的事情，是他家的第二次败落。到了钱塘县，王汎生了两个儿子，大的叫王蒙，小的叫王诵。王诵就是王充的父亲。那知“祖世任气，至蒙、诵滋甚”，他们在钱塘县“勇势凌人”，又和豪强地主丁伯等结下了怨仇，不得不再次搬家，搬到了上虞。王充就出生在上虞。这是他家的第三次败落。

从这些情况来看，可见王充一家，虽然曾经一度爬到封建贵族的行列，但却没有能保持下去，而是很快就败落下来，先后以“农桑”和“贾贩”为事。当然，这并不是说，王充家就变成了普通的劳动人民，或者象有些人

^① 《后汉书·百官志五》：“列侯……功大者食县，小者食乡、亭。”

说的，变成了农民，因而王充是“当时一般苦难农民的意识”的代表^①，他的思想，“反映了农民斗争朴素而天真的性格”^②。我们说，不是的。王充家能够一次又一次地从这一县搬到另一县，而且“勇势凌人”，敢于和豪家“结怨”，这难道是一般农民所能办到的吗？后来王充能够到京师汉皇朝的最高学府太学去学习（按规定要六百石以上官吏的子弟才能入学^③），就更说明了他家尽管一再败落，但还是有一定的地位和身份的。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说，王充的家庭出身，虽然不是豪强地主，但也不是一般劳动人民，而是没落了的中小地主阶级。这一家庭出身，给他的思想打上了深刻的阶级烙印。关于这点，我们在后面谈到《论衡》产生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时再说。

比起家世的坎坷来，王充本人的身世，也是充满荆棘和斗争的。东汉时，豪门世族把持仕途，中小地主要做官吏，只好先读书。王充六岁开始识字，八岁进入书馆读书。他很用功，但儒家那一套《论语》、《尚书》之类的经典，却使他感到厌倦。因此，二十多岁的时候，他就怀着强烈的求知欲，千里迢迢，从上虞来到京师洛阳，进入太学。当时主持太学的，是儒学大师班彪。《后

① 翦伯赞：《中国史纲》第二卷 645 页。

② 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 261 页。

③ 《后汉书·儒林传上》：“本初元年，梁太后诏曰：‘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

汉书·王充传》就说他：“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然而，这样重大的一件事，在他自己写的《自纪篇》中，却根本不提，只是暗示了一句：“谢师而专门”。这一方面说明了他对“博士”麇集、腐儒成群的太学，对太学那种把读经和造讖当作升官发财的捷径、只知“笃守师法”、死背硬记的学风，以及对宣扬“王命论”、“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焉”^①的班彪，都是有看法的，不满意的，因此，他要“谢师”。另方面则说明了他的思想和目光，已经远远超出和背离了太学“圣经贤传”的范围，他要博览古今，兼通诸子百家之说。《王充传》说他：“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这“众流百家之言”里面，自然包括了商鞅、韩非等人的法家著作在内。因此，他毅然冲破太学的牢笼，走向洛阳书肆和社会，从而大大打开了他的视野和思路，为他以后反儒尊法的斗争，准备了条件。

本来，太学是做官的捷径。在“以师为吏”的汉朝，只要上面有老师提拔，功名富贵，唾手可得。但是王充对太学和老师班彪，采取这样的态度，自然要被目为“异端”，受到排挤了。因此，洛阳虽大，却容不下一个象王充那样具有“离经叛道”思想的青年。他只好回到乡里，“屏居教授”，当教书先生了。

^① 班固：《汉书·叙传》。

教书之外，他在乡里还当过一些幕僚性质的小官。“在县位至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掾功曹，在太守为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入州为从事。”这些官，不但都很小，没有什么实权；而且由于他出身寒门，没有靠山，又常常对当时的恶劣风气和反动势力采取抗争的不妥协的态度，所以即使这样的小官，他都没有能够做多久。《后汉书》就说他：“以数谏争，不合去。”他在《自纪篇》中，也一再谈到：“仕数不耦”。因此，他终于不得不“闭门潜思”，著书立说，从思想上来和当时的反动派展开斗争。

但是，在孔老二“学而优则仕”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一个读书人当不了官，专门做学问，这本身就是叫人看不顺眼的。何况王充的著作，大多都是针对当时占“独尊”地位的儒家而发的，具有强烈的战斗精神呢？因此，白眼和仇视，流言和蜚语，以至数不清的叽叽喳喳的奇谈怪论，都无中生有地铺天盖地而来！《自纪篇》中，王充记录了不少这种诽谤性的言论。例如有人说他：“文刺于俗，不合于众。”有人说他：“不类前人。”还有人直接指斥他“涉世落魄，仕数黜斥”，当不了官，却来写文章，这又“何补于身”，有什么用呢？更有甚者，有人骂他的祖宗，说：“吾子何祖，其先不载；况未尝履墨涂，出儒门；吐论数千万言，宜为妖变，安得宝斯文而多贤？”这是说，王充没有显贵的祖先，没有有地位的老师，写的东西，只能是“妖变”，毫无价值可言。

到了章帝元和三年(公元八六年),因了刺使董勤的关系,他到扬州一带做了三年官。由从事转为治中。在地方幕僚之中,这是比较高级一点的官。但不久,也就“罢州家居”。这时,他快七十了。“仕路隔绝,志穷无如。”“贫无供养,志不娱快。”可见他的老境的悲凉和坎坷了。然而,就在这时,他还作了“《养性》之书,凡十六篇。”连他以前写的《政务》、《讥俗》、《论衡》,这应当是他的第四本书了。但除了《论衡》之外,其它的都没有流传下来。

王充的一生,就是这样坎坷的一生。然而,他并没有屈服。特定的阶级地位和时代潮流,把他卷进了新形势下儒法斗争的漩涡,终于使他成了东汉时期法家人物的杰出代表。他在儒家正统势力的打击和诽谤之中,坚强地斗争!年轻时,他敢于蔑视班彪的权威,把太学的金字招牌当作破扫帚一样扔掉。在独尊儒术的思想统治中,他偏偏“博通众流百家”的著作。当儒生们“坐守师法”^①,象“鹦鹉能言之类”^②,满口“至圣先师”,把学问当成“利禄之途”的时候,他却“不贪富贵”、“不慕高官”、“幽处独居,考论实虚。”那就是说,儒生们读书明经,无非是要寻找向上爬的敲门砖。王充却不然。他“甘闻异言”,他要“辩照是非之理,使后进晓见

① 《谢短篇》。

② 《超奇篇》。

然否之分。”^①总之一句话，在当时一片尊孔读经、谈神论鬼的恶浊空气里，他偏要独树一帜，非圣反儒，疾妄订虚。这就充分表现了他大无畏的战斗精神。他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也是战斗的一生。

王充的战斗业绩，虽然也表现在他做官时的政治斗争以及其它一些方面，但主要的还是表现在著作上。这固然和王充个人特殊的遭遇分不开，但也反映了东汉时期中小地主阶级中的进步知识分子，以及具有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由于他们在政治上没有地位，没有可能从政治上来实现他们的革新主张，因而主要的只能通过著书立说，来表现他们的进步思想。王充也正是这样。他写书都有明确的现实的和政治的目的。例如，他写《政务》、《讥俗》之书，是为了要“匡正”“人君”的“不得其宜”的政治方法，反对儒家那一套反动的政治主张和虚伪势利的社会风尚。至于他写《论衡》，更是具有鲜明的战斗目的。因此，王充不是为了写书而写书。他写书，是为了战斗。战斗是目的，写书不过是手段。

正因为王充是为了战斗而写书，所以他投下了全部的精力。《王充传》说他：“绝庆吊之礼，户牖墙壁，各置刀笔。”至于儒生们对他的叽叽喳喳，流言蜚语，他更毫不退让，迎头痛击。人家说他祖宗不显耀，不是阀阅世族，他回答说：看人主要看本人的才能，不能看他的

^① 《对作篇》。

出身。杂色的母马产出来的赤色小马，同样可以做祭神的牺牲；微贱的祖先，同样可以产生出杰出的后人。这话在今天看来，极为平常，但在门第森严、讲究家传师承的东汉，则无异是在死水潭中投下一颗烈性炸弹！没有大无畏的精神，是办不到的。人家说他官运不好，因此写出来的书不可能好，他更是振振有词，严加驳斥：“达者未必知，穷者未必愚。”并无比蔑视地说：你们以为无知而显达，无德而官大，是光荣的，但我却以为是可耻的呢！

就这样，王充战斗了一生。由于他具有顽强的战斗精神，所以在尊孔潮流横行一时、谶纬神学乌烟瘴气的东汉时代，他能够坚持法家的进步立场，敢于“问孔”“刺孟”，敢于论评“世俗之书”，贬黜“虚妄之语”，从根本上动摇了儒家的一统天下！为了更好地了解王充在儒法斗争史上所建立的巨大功绩，我们有必要进一步了解他所处的时代背景。

（二）风云变幻的斗争时代

“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①”。

^① 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二卷第51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研究王充的生平和思想，自然也必须如此。王充的一生，经历了光武、明帝、章帝和和帝四个朝代，这正是东汉王朝从建立以至开始走向衰落的一段时期，也就是东汉前期。历来封建史学家所标榜的“光武中兴”、“明章之治”，指的正是这一段时间。那么，这一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势究竟怎样呢？它对王充思想的发展又有什么影响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主要想谈两点：(1)西汉末年的农民革命和“光武中兴”、“明章之治”的关系；(2)儒法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深入。

1. 西汉末年的农民革命和所谓的“光武中兴”、“明章之治”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①然而，过去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他们却大力宣扬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大肆吹嘘什么“光武中兴”、“明章之治”的所谓“太平盛世”，是“圣帝明王”施行“仁政”的结果。这是对历史的恶意歪曲。我们认为，所谓的“光武中兴”

^① 毛主席：《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88页。

和“明章之治”，绝不是少数帝王将相的什么“文治武功”，更不是他们推行儒家路线的“仁政”的结果，而是西汉末期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有力地冲击了封建生产关系中那些最腐朽、最反动的部分，从而解放了生产力，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的结果。

公元前二〇二年，刘邦凭借农民大起义扫荡奴隶主残余势力的斗争所造成的历史趋势，建立了西汉王朝。这时社会主要的矛盾，是巩固新兴地主阶级政权与反对奴隶主复辟势力的斗争。但随着奴隶制复辟危险逐渐成为过去，地主阶级也就逐步从真老虎转化为纸老虎。汉元帝以后，放弃汉初以来的法家路线，推行儒家路线，正反映了这一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这时，地主阶级和农民的固有矛盾日益尖锐，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皇室、贵族、大官僚、大地主以及富商大贾，他们剧烈的土地兼并，惨重的徭役和赋税，加上连年的灾害，使得贫富愈来愈悬殊，人民活不下去。“百姓或短褐不完，而犬马衣文绣；黎民或糠糟不接，而禽兽食粱肉。”^①于是，到处出现了“官乱民贫，盗贼并起”^②的反抗怒火。王莽打着“复古改制”的旗号，妄图“复千载绝迹”，按照“周礼”把历史拉回到“井田制”和奴隶制的时代。这当然不但不能解决当时尖锐的阶级矛盾，反而

① 《盐铁论·散不足篇》。

② 《汉书·贡禹传》。

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于是，被逼得走投无路的广大农民，揭竿而起。南方的绿林，东方的赤眉，北方的铜马等，全国规模的农民大起义的烈火，有如怒火燎原，势不可当，由几百人迅速发展到几十万人。他们攻城陷镇，摧枯拉朽，锋芒所向，直指封建统治阶级的巢穴，几次攻入当时的京城长安，彻底摧毁了王莽的复辟王朝，同时也沉重地打击了地主豪绅的反动气焰，涤荡了当时封建社会中最黑暗、最腐朽的势力，为社会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前景。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篡夺了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而建立起来的东汉王朝，才得以采取和实行某些法家的进步政策和措施，从而出现某种“中兴”和“治世”的局面。这些政策和措施的具体内容，主要有下列几点：

第一，加强中央集权，反对地方割据：统一还是分裂？这是复辟和反复辟、儒家和法家斗争的一个关键问题。当时地方的割据势力，如东方的张步、北方的彭宠、西方的隗嚣、西南的公孙述、南方更始军队的残部等，都是一些豪强地主，都是主张分裂的。刘秀本人虽然也是豪强地主，但他能够削平割据，完成国家的统一。在这个意义上说，还是符合当时广大人民的要求的。同时，他吸收西汉末年中央集权削弱的教训，竭力加强皇帝的权力，“功臣并不用”^①，也就是封为列侯而

^① 《后汉书·贾复传》。